



刚到安庆的那些年，我仍然保持着在县城工作和生活的习惯，敬业、勤俭、简单。下班后在路口带一把青菜回来，下米，洗菜，三分钟炒熟，就着一罐腌菜或咸鱼，从进门到吃完，半小时搞定。

不久，胃炎复发。我做过两次



姚岚，1963年生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，安庆市文联副主席，安庆市作家协会主席，《振风》主编。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《留守》《花开何处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疼痛》《越狱》，报告文学集《雁过留声》，散文集《风景无价》等，长篇小说《留守》获得安徽文学奖二等奖（省政府奖），被业内誉为全国第一部反映留守群体的长篇小说。获得安徽文学奖（省政府奖）等各类奖项几十次。



这些年，隔些时日，免不了要去幼稚时的居住地——安庆师大菱湖校区。我，既非安庆师范大学教职员工，也非其学子，只是其职工子弟。到那里，看看爸妈是一定的，还喜欢去学生食堂吃顿饭，看看一张张粉团团的笑脸，去图书馆闻闻书香，然后去红楼和敬敷书院转悠转悠，听听樟树林里的清风鸣蝉，回望来时的路。

说起安庆师大，当然首提红楼。时光荏苒，这幢中西合璧的建筑已成国宝了，是安庆师大的标识。儿时仲夏夜，我常喜欢去红楼纳凉，红楼旁翠柏森森，加之屋顶为宫殿式，高大幽深，南北、东西通透，清幽僻静，清凉无比，夜里只要把凉席往二楼楼板上一放，人一会儿就能进入梦乡。可睡到半夜，总觉得不踏实，总觉得耳畔有人在哭，怕得很。慌不择路地逃回了家。

一直忘不掉77级中文系的那个30多岁的男同学。他喜欢在夜晚把一个叫梅子的女同学往红楼南边的露天平台上带。梅子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。露天平台前两侧共有6根圆型石柱，门檐为半园形，西洋风格，特洋气，有情调。小女孩都喜欢情调。他们常在那里或朗诵，或歌唱，

老城贤医

姚岚

胃镜，吃过许多药，未见好转。那时我住菱湖新村，门口就有一家小超市。我到超市里选了最细的鸡蛋面条，煮得糊糊的，每天晚上吃一碗，早上也不敢吃糍糕、烧麦、山芋了，没想到半年后，胃病就无影无踪。

我出生于农家，成长于学校，母亲四十多岁时生了我这个幺女。我从小营养不良，体质羸弱，但我素喜体育运动，性急，做事风风火火。无论在哪个岗位，我总是工作第一，写作第二，孩子第三，生活第四。胃病有了不在乎，咳嗽三个月懒得进医院，动不动流鼻血……这些在我眼里，从来就不是病。就这样一直干到孩子上了大学，我也调到了安庆。

但，当我常常想不起人名，当我常常烧破开水壶，我开始惊惧了。我为什么比著名作家石楠老师的记忆力还差呢？她当时是快八十多岁的人了，不仅脸上没有皱纹，还能对许多文化名人如数家珍。她可是比我大二十五岁啊！她住在菱湖的南边，不远，我时常穿过菱湖公园步行到她家，留心观察她的生活习惯，深有感触。

渐渐地，我开始审视自身。原来我的身上，毛病还挺严重的：长期失眠，长期便秘，但我一直不在意，腹部鼓胀得受不了时就去药店买一盒黄连上清片服下。后来医生朋友告诉我，喝这种药只能解决一

时之需，长此下去，肠子会越来越细，时日久了还会变黑，无法挽救。这一说，吓了我一大跳。

我懵了。我这样有几十年吧？可我以前根本就不知道这是病啊。我开始寻访老中医。安庆大街上的“国医堂”和小巷子里个体诊所还真不少。

孝肃路老旧的居民楼一楼，很小的一居室，有位80多岁的老中医。每天早上7-9点只坐诊两个小时。我很好奇，起个大早跑去排队。捉脉，自制药丸，自备草药。患者往往6点就去排队，怕轮不上。老医生很认真查找各人的页码，填写病历，但不喜欢说话，只能他问，患者不能问，问了要么懒得理你，要么不耐烦。望闻问切，他也是常常示意你张口、伸舌……方子一开，就让儿子抓药。九点一到，管你怎么说好话，他径直收拾诊器，扬长而去。听他儿子说，他需要准时去公园里溜达。

我心想，大概名医就是这样的习惯和脾性吧。

那几年，我每隔半个月就起早去老巷子里排队，即使心有疑问，见那么多人早早排队，还是带着几许崇拜和期待，按时按嘱吃着他开的药。两年过去，我的失眠与便秘并没有明显好转。我想，必须换个医师了。

让我终身受益的是健康路上何宏敏中医诊所里的坐堂医师何宏敏

先生。

何医师为人和善、热情，喜欢拉家常，全天上班。墙壁上贴的各种医患注意事项，都是他自己用毛笔抄写的。他有种独特的挂号方式：一张小纸片，名片大小，正面是诊所的联系方式，背面是患者姓名、编号和表格。每次诊视完，他都会在表格上写上日期，方便下次查找病历。

白衣天使形象在我心目中日益高大起来。何宏敏医师不仅耐心、诚恳、仁爱，还向我细说医理。他一再叮嘱我，喝药只是辅助，关键在养成好的生活规律和习惯。他的话对我如醍醐灌顶，我开始深刻反省过去的生活，真的是太忽视太粗糙太简单了。

我很信任他，便在他那里捡药，一直喝了两三年。与其说开药，不如说是心理和行为纠正。我开始纠正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，开始讲究养生之道，开始研究生活，并且时常反省自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生活和教育上所犯的错误。

今年春节前后，我又咳嗽了很长时间。恰遇新冠肺炎，人心惶惶，我不敢去医院，只得打电话给《古越月大夫的美丽人生》的作者胡志平医师，她微信指导我买药，悉心叮嘱。真是医者仁心。她退休后被医院留用十年，之后花4年时间完成30万字的励志长篇小说。她和老作家老医务工作者顾乐生一样，都是那么敬业、善良、积极而乐观地对待人生。每每从他们身上，我不仅感受到醇厚的人间温馨，还常常受到激励和鼓舞，心态也积极乐观起来。

红楼忆

陈向东

象打了鸡血样，高亢激昂。夜阑更深，万籁俱寂，该散去了，梅子双颊绯红，面若桃花，两眼亮晶晶的，似玛瑙，象宝石，闪着奇异的光，

可能因为家父也是中文系老人的缘故，教职工中的长辈们给了我那么多宽容和便利，我得以自由地出入红楼里的中文系资料室。中文系资料室在当时就是大图书馆下面的小图书馆，是馆中馆，专业文献资料之丰富雄居西南各馆之首。我阅读了那么多门类齐全、品种繁多的期刊，如《人民文学》《上海文学》《十月》《当代》《收获》《清明》《花城》《江南》《红岩》《小说界》等等，各省市的小型文艺期刊更是不胜枚举。在红楼，我几乎读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那一批作家的成名作，那是一篇小说就可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时代。我还特别关注喜欢本土作家的作品，同在一个城市，我想看看他们究竟有何过人之处。预告出来后，就急匆匆去资料室找寻。在这里，我知道了本土作家熊尚志、曹玉林、金海涛、潘军、耿龙祥。耿龙祥老先生的《月华皎皎》《杨花似雪》让我痴醉，还

有他家公子发在《清明》上的几个中篇，我叫不了名了，很先锋、很写意、很意识流，还有我十分尊敬的黄复彩老师，尽管他带我参加过好多笔会，带我见过仁德大和尚和圣辉大和尚，可那时我觉得黄老还不著名，比我强一层纸，当然黄老现在是大家了，我服。真的。

上个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，真的是繁花似锦，激情四射。那年月，中文系资料室就是中文系的文艺沙龙，我有幸在这里听先生教授们谈天谈地、纵横捭阖、漫无边际地闲扯。文人们在一起，一句话，一个字，都能蹦出四溅火星，他们各不相让，像打架的公鸡，可那睿智，那锋芒，那妙趣横生，常叫人拍案叫绝。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，比如说，研究吴承恩的石钟扬教授，生性就象他研究的西游、水浒人物一样，大大咧咧的，飘逸洒脱，难怪后来又研究《金瓶梅》去了。我也常常被石教授调侃戏谑，可我不恼，认为这是先生赞许我，心里美滋滋的。我的邻居孙维成教授，研究古典文学，专攻古诗词，为人处世作派，讲究一招一式，讲

究“平仄”和“韵律”，严谨规范。孙教授每次见到我，总是嘘寒问暖的。1982年开始，蒙编辑老师不弃，我也开始在《安庆报》《安庆日报》《振风》等报刊发小文章了，孙教授每每看到，总是给我许多溢美之词。才女王海燕教授，研究现代文学“新月派”，举乎投足尽显华贵优雅，可奔放中又不失内敛周全。王教授说话细语和风的，特好听，她人缘好，师生们都喜欢她，后来还做了安庆师院（安庆师大的前身）的副院长。



陈向东，1964年生于安徽桐城，1982年6月毕业于桐城师范学校，曾任中学数学教师、公务员。业余爱好写作，出版有散文集《飘逝的红霞》。